

城 - 镇 - 乡人口教育差距的 演变及影响机制

黄维海, 刘梦露

[摘要] 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以平均受教育水平测量的城乡人口教育差距,并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倒U型发展,乡村、县镇与城市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扩大。对近20年间差距演变的过程进行分析表明,乡村和县镇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增长速度始终低于城市,尤其是县镇区域几乎没有增长。通过对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促使已经存在的差距自然消弥,城乡两个被分割的群体通过显性渠道与隐性渠道不断地文化教育再生产是差距存在和扩大的社会基础;高中阶段教育投入的增加更多是促进了城镇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初中阶段教育投入城乡差距的扩大直接导致人口受教育程度差距的扩大,而小学阶段教育投入城乡差距没有显示出统计上显著的影响;非户籍人口流动造成城乡人口结构的异质化,并进而扩大城乡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户籍人口迁入对城市和县镇人口受教育程度都有提升作用,迁出在抵消迁入的提升作用后,仍然导致城市与县镇之间教育差距的扩大。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平均受教育水平;城乡教育差距

一、引言

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当城乡劳动生产率基本均等后,城乡二元结构现象也就基本消除,在这一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中,教育资源及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城乡一体化是基础的、重要的

[收稿日期] 2016-06-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卓越农业人才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需求预测和教育培养:对长三角地区的研究”(15YJC880023);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江苏省新型城镇化进程对乡村人力资本的需求与培育研究”(SK2015006)。

[作者简介] 黄维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电子邮箱地址:hwhgslz@163.com;刘梦露,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电子邮箱地址:bzliumenglu@163.com。

内容。然而,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既存在一般规律,也有特殊性,本研究发现,由于社会变迁、教育运行体制、人口迁移流动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近二十年来,不仅城乡之间既有的教育差距没有缩小,城市与县镇之间也出现差距并不断扩大。

当前对城乡教育差距的研究可大致归为两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主要涉及个体在城市和乡村能够接受教育的数量和质量的差距,其热点聚集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如王志勇(2012)利用基于上海、浙江和福建的家庭动态调查数据,从个体求学经历的角度分析了城乡不同教育环境下人们的教育成就差异。发现在城市教育环境下,人们的教育成就就会明显提升;相反,在农村教育环境下,人们的教育成就显著降低,即教育环境的城乡不平等是造成城乡之间教育成就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李春玲(2014)考察1940-2010年各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通过对5个出生年龄组的比较,发现小学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平等在下降,初中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平等没有变化,高中及其他高级中等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平等持续上升,而这正是导致农村子弟上大学相对机会下降的源头。二是宏观层面的研究。如邬志辉(2012)提出我国当前城市中心区与郊区教育一体化的问题形态主要是教育的“半郊区化”,县镇与乡村教育一体化的问题形态主要是农村教育的“过度城镇化”。李玲等(2012)则通过对师资配置、人事交流机制、财政性教育经费、硬件资源配置、课程与培养模式、质量与评价六个方面的构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指数,并实际测算西部地区6个县的一体化程度,发现在师资、经费等多方面城乡一体化的程度都是比较低的。至于造成城乡教育差距的原因,包括邬志辉在内的主要研究(褚宏启,2009;张旺,2012)都归因于教育管理、教育投入、教师管理以及教育质量保障等几个方面。

总体来看,对城乡教育差距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的差异方面,宏观层面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财政经费、师资、制度等教育资源投入的差异方面,对教育结果的城乡差距,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研究关注度都不高。尽管教育机会、教育投入、教育过程等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个体之间最终教育成就的公平与否,并且占据了人们当前对城乡教育公平理解的主要内容。但是,从教育、人口、社会结构的综合视域全面分析城乡教育一体化问题,直接考察教育结果的城乡差距,要比只观察机会不公和教育投入的不公对理解城乡教育差距问题更为现实和直接有效。本文以各省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为分析指标,讨论在社会变迁、人口变动和教育运行体制综合影响下的城乡教育差距,探寻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策略。

二、城-镇-乡教育差距的测算

以教育结果考察城乡人口的教育差距,最直接的表现是城乡人口受教育程

度的差异^①,其又包括受教育程度分布的差异和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本研究选择城乡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为分析指标,是因为平均受教育水平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指标,它既体现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和强度,即教育的入学率和完成率;又隐含社会需求引导下的人口受教育分布结构,即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的规模和比重。至于城乡的含义,一般意义上理解为城镇和乡村,本研究使用国务院批复《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即“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乡村是指本规定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区域。”^②按照这个标准,将各省按照城区、镇区和乡村分解开后,分别测算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使用公式如下:

$$S_t = \frac{\sum_{j=1}^7 dur_j L_{jt}}{\sum_{j=1}^7 L_{jt}} \quad (1)$$

式(1)中的 S_t 即在 t 年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它是6岁及以上社会人口所受教育年数的总和与全部人口的比值; L_{jt} 是 t 年时学历为 j 的人口数, j 按照中国情况分为未上过学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职)、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7类。 dur_j 是学历为 j 的受教育年数系数,现行国家统计中仍然采用现行学制年数为系数,文盲或半文盲0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及中专(职)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使用这种系数的计算结果略高于其它系数^③,但其优点显而易见,一是计算简便,数据易得;二是直接与学制挂钩,避免了对系数的主观赋值和专项调查;三是可以及时反映教育规模 and 水平的变化^④。

使用公式(1)和《中国人口普查资料》,本研究计算得到全国不分城乡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在2000年达到7.62年,2010年提高到8.80年,这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致。

① 当然也可以表现为学业成绩的差异、技能水平的差异等,但目前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并公开发布的学业成绩体系,受教育的程度(最高学历)依然是主要的可以用来度量个人教育成就和社会教育产出结果的指标。

② 国务院:《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规定的批复》(国函[2008]60号),2008年。

③ 还有两种系数,一是以实际调查结果为系数,如1998年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在受教育程度项中增加了受教育年限的内容,在实际调查基础上计算出的系数为:大专及以上14.34年,高中及中专11.06年,初中8.12年,小学4.23年;二是以学制为基础设定固定系数,即在学制的基础上加入毕业、肄业和在校等几种情况,人为设定一套系数。

④ 使用这种系数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忽略了教育中的留级、辍学、复读、结业、肄业以及弹性学制等特殊情况,使受教育水平数据不够精确。但一个重要的选择依据是可以与现行国家统计数据相对接。

表1 1995-2013年平均受教育水平

	总体			城区			乡村			镇区		
	1995	2005	2013	1995	2005	2013	1995	2005	2013	1995	2005	2013
全国	6.72	7.83	9.05	8.41	9.57	10.83	6.05	6.78	7.71	8.16	8.32	9.22
北京	9.24	10.69	12.03	10.12	11.23	12.56	7.20	8.24	8.92	9.64	10.01	11.68
天津	8.20	9.51	10.54	8.93	10.70	11.43	6.73	7.48	8.34	6.69	8.46	9.15
河北	6.77	8.17	8.90	8.56	9.92	10.92	6.43	7.53	8.05	7.62	8.56	9.04
山西	7.53	8.42	9.36	9.03	9.87	10.72	6.88	7.62	8.30	9.04	8.91	9.58
内蒙古	7.00	8.22	9.01	8.52	9.90	10.26	6.11	6.71	7.86	8.36	8.56	9.08
辽宁	7.64	8.75	10.10	8.82	9.97	11.51	6.63	7.45	8.00	8.47	8.44	9.51
吉林	7.77	8.47	9.40	9.03	10.11	11.31	6.62	7.24	7.86	8.61	8.66	9.29
黑龙江	7.53	8.46	9.48	8.65	9.53	11.04	6.60	7.25	7.94	8.42	8.95	9.72
上海	8.79	10.03	10.56	9.33	10.50	11.25	6.64	7.53	7.15	8.36	8.72	9.11
江苏	7.00	8.13	9.42	8.95	9.63	10.75	6.27	6.98	8.15	8.79	8.10	8.99
浙江	6.42	7.61	9.37	7.54	8.63	11.07	5.99	6.61	7.73	7.03	7.92	9.18
安徽	6.15	7.04	8.52	7.98	9.04	10.61	5.69	6.20	7.42	8.22	7.80	8.94
福建	6.11	7.54	8.65	7.94	9.15	9.84	5.65	6.46	7.57	7.02	7.80	8.67
江西	6.28	7.53	9.24	7.82	9.28	11.15	5.91	6.72	8.18	8.35	8.56	9.78
山东	6.66	7.72	8.92	7.73	9.14	10.58	6.15	6.86	7.74	7.82	7.98	8.98
河南	6.72	7.99	8.78	8.69	10.01	11.17	6.42	7.34	7.88	7.72	8.42	8.93
湖北	6.72	7.82	9.34	8.10	9.39	11.12	6.07	6.81	7.84	8.18	8.47	9.69
湖南	6.78	7.99	8.96	8.24	9.48	10.63	6.34	7.20	8.15	8.22	9.16	9.23
广东	7.10	8.36	9.23	8.14	9.27	10.21	6.37	7.20	8.00	8.30	8.45	8.92
广西	6.58	7.66	8.59	8.17	9.64	10.34	6.18	6.90	7.59	8.54	8.73	9.24
海南	7.03	8.11	9.19	8.75	9.18	11.08	6.38	7.08	8.20	8.73	8.53	9.44
重庆		7.39	8.68		9.15	10.73		6.31	7.13	0.00	8.07	9.05
四川	6.37	6.84	8.45	7.51	9.13	10.02	5.83	6.01	6.97	8.41	8.10	10.40
贵州	5.62	6.42	8.04	7.44	9.18	11.27	5.04	5.65	6.84	7.39	7.88	9.00
云南	5.33	6.38	7.84	7.90	8.10	10.15	4.92	5.63	6.87	7.79	7.74	8.33
西藏	2.57	3.74	4.37	7.54	5.84	6.56	1.85	3.24	4.09	6.84	4.24	4.22
陕西	6.85	8.06	9.28	8.73	10.18	11.19	6.09	7.08	8.22	8.78	8.42	9.68
甘肃	5.49	6.86	8.35	8.27	9.92	11.00	4.52	5.95	7.16	9.28	8.08	9.25
青海	5.18	6.76	7.96	8.36	10.01	11.07	3.94	5.15	6.26	7.86	8.52	8.29
宁夏	6.21	7.37	8.71	8.69	9.67	10.46	5.06	5.96	7.22	9.12	8.67	8.98
新疆	7.03	8.20	8.99	9.31	9.98	10.42	6.06	7.34	7.93	8.33	8.94	9.60

区分城乡后,使用同样的方法和《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测算得到全国及各省份城区、镇区和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数据(主要数据见表1^①)。

三、城-镇-乡人口教育差距的演变:1995-2013年

考察城区、镇区、乡村之间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在近20年间(1995至2013年)的演变轨迹(图1)可以发现,城区和镇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在90年代中期是非常接近的(城区8.41年,镇区8.16年),但随后,城区的水平不断上升(2013年达到10.83年,提高了2.42年),县域范围内镇区的水平虽有提高(2013年为9.22年,提高了1.06年),但增长幅度有限,二者的差距不断扩大(从1995年相差0.25年扩大到2013年相差1.61年)。与此同时,乡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有所上升(从6.05年上升到7.71年),虽然与城区的水平差距有所扩大(从1995年相差2.37年扩大到2013年相差3.12年),但是与镇区的水平差距却在显著缩小(从1995年相差2.11年缩小到2013年相差1.51年)。

表2所示为1995-2013年各省受教育水平差距的变化。从城乡受教育水平差距的变化(2013年受教育水平城乡差距-1995年受教育水平城乡差距/1995年平均受教育水平)看,有15个省份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距扩大迹象(变化程度大于10%),按照差距扩大的程度排序分别是:贵州、浙江、四川、山东、湖北、辽宁、江西、上海、河南、安徽、黑龙江、吉林、广西、河北、天津。

受教育水平城乡差距小幅扩大的省份有9个(变化程度在0到10%之间),按照差距扩大的程度排序分别是:湖南、北京、青海、海南、广东、云南、陕西、山西、甘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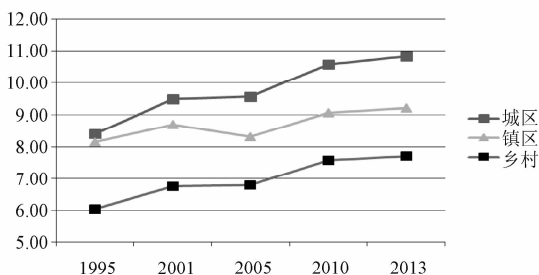


图1 1995-2013年城区、镇区和乡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① 需要说明的是,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开资料和统计年鉴都没有提供2000年各省分城乡的人口受教育程度数据,最接近的是2002年由《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提供的2001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表2 1995-2013年各省城乡、镇乡受教育水平差距变化

	1995年 城乡差距	2013年 城乡差距	城乡差 距变化	城乡差距 变化程度 (%)		1995年 镇乡差距	2013年 镇乡差距	镇乡差 距变化	镇乡差距 变化程度 (%)
贵州	2.39	4.43	2.04	36.24	四川	2.58	3.43	0.85	13.41
浙江	1.55	3.33	1.78	27.69	天津	-0.04	0.81	0.85	10.30
四川	1.68	3.05	1.37	21.56	浙江	1.04	1.45	0.41	6.33
山东	1.58	2.84	1.25	18.83	北京	2.44	2.76	0.32	3.47
湖北	2.03	3.27	1.24	18.47	上海	1.72	1.96	0.23	2.66
辽宁	2.20	3.51	1.31	17.17	黑龙江	1.82	1.77	-0.05	-0.62
江西	1.91	2.97	1.06	16.94	河北	1.19	0.99	-0.21	-3.06
上海	2.69	4.09	1.40	15.98	贵州	2.34	2.16	-0.18	-3.28
河南	2.27	3.28	1.01	15.07	河南	1.30	1.05	-0.25	-3.73
安徽	2.29	3.18	0.89	14.44	湖北	2.11	1.84	-0.27	-4.02
黑龙江	2.04	3.09	1.05	13.92	福建	1.36	1.10	-0.26	-4.21
吉林	2.40	3.44	1.04	13.35	辽宁	1.84	1.51	-0.33	-4.37
广西	1.99	2.75	0.75	11.44	山东	1.67	1.24	-0.43	-6.38
河北	2.13	2.87	0.74	10.88	吉林	1.99	1.43	-0.56	-7.17
天津	2.20	3.09	0.89	10.82	新疆	2.27	1.67	-0.59	-8.42
湖南	1.91	2.47	0.57	8.35	广西	2.36	1.65	-0.71	-10.73
北京	2.93	3.64	0.72	7.75	湖南	1.89	1.08	-0.80	-11.82
青海	4.43	4.81	0.38	7.38	山西	2.16	1.27	-0.89	-11.83
海南	2.36	2.87	0.51	7.26	江西	2.44	1.60	-0.84	-13.31
广东	1.76	2.21	0.45	6.29	广东	1.92	0.92	-1.00	-14.14
云南	2.99	3.28	0.29	5.53	内蒙古	2.25	1.23	-1.02	-14.57
陕西	2.64	2.97	0.33	4.80	海南	2.35	1.24	-1.12	-15.89
山西	2.15	2.41	0.26	3.51	安徽	2.53	1.52	-1.01	-16.51
甘肃	3.76	3.84	0.08	1.49	陕西	2.69	1.46	-1.23	-18.03
内蒙古	2.41	2.41	0.00	-0.01	江苏	2.52	0.84	-1.67	-23.91
福建	2.28	2.27	-0.01	-0.19	云南	2.87	1.46	-1.41	-26.52
江苏	2.68	2.60	-0.08	-1.16	青海	3.93	2.04	-1.89	-36.47
宁夏	3.62	3.24	-0.39	-6.21	宁夏	4.06	1.76	-2.30	-36.94
新疆	3.25	2.49	-0.75	-10.69	甘肃	4.77	2.09	-2.68	-48.73

虽然大部分省份表现出受教育水平城乡差距扩大的迹象,但也有5个出现了缩小,分别是内蒙古、福建、江苏、宁夏、新疆。其中只有新疆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城乡差距缩小迹象,其它4个省份缩小的幅度都非常小,且在考察期还存在差距先扩大后缩小的反复与波动。

而从镇乡差距的变化(2013年受教育水平镇乡差距-1995年受教育水平镇乡差距/1995年平均受教育水平)来看,只有五个省份表现出差距扩大的迹象,分别是四川、天津、浙江、北京、上海。其它省份县镇和乡村之间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差距都是呈现缩小迹象的。

综合来看,无论是镇区还是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增长速度都慢于城区;镇区的增长速度最为缓慢,从与城区水平基本一致演变为出现明显的差距;虽然镇区和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并由此导致县域内城乡教育一体化程度提高,但这是一种低层次的、被动的城乡一体化,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城市与县域教育一体化程度的降低。可以说,近二十年来,县域范围内镇乡教育一体化的程度在被动提高,而城市与县域内镇乡之间教育一体化的程度在下降。

四、城-镇-乡人口教育差距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一)文化教育资本再生产的自我强化形成了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差距的社会基础

近代以前的中国,在农业文明和儒家文化的双重影响下,精英知识分子大量散居在乡间,或者说并没有太多的动力能够使他们聚集在城市。占人口绝大部分的普通民众,无论是城市手工业者,还是乡村农民,接受教育都非常有限。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一定规模的精英知识分子集中在城市,但总体上,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应该是不大的。

现代学校教育兴起后,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产生于城市、发展于城市,并不断吸引受过教育的人聚集于城市。尤其是随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中国的逐步确立,文化教育领域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被分割的文化圈——城市优势文化圈和农村劣势文化圈。两个文化圈分割的文化和教育再生产机制,造成城市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不断被强化,农村的文化和教育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善。

经过“上山下乡”运动和文革对社会结构以及再生产机制的激烈冲击与非正常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教育再生产对城乡人口教育差距的影响再一次显现。恢复高考初期,家庭教育背景是不同群体受教育程度差异的主要原因。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社会分化加剧,阶层背景的效用显现,家庭将其社

会经济资源转化为子女教育机会的优势,文化、教育再生产机制与资源转化机制开始双重影响。在这一阶段,城市家庭由于既有的教育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通过显性渠道——制定教育规制(如入学条件、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考核机制等)以及隐性渠道——提高社会竞争力(如帮助子女更好适应学校环境、提供更多的课外辅导和社会实践锻炼机会、培养更符合主流社会规范的人格特征、建立更广泛的人际网络等),使城市儿童在教育竞争中获得更大的机会。教育机会的差异最终表现为受教育结果的差异,进而转化为合理的社会竞争机会,从而强化了城市优势文化圈自身的存在。

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来看,城乡两个文化圈分割的程度越强,城乡文化、教育差距被再生产的动力就越大。在一定意义上说,教育的再生产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优势文化发展和自然选择、淘汰的过程中,加剧了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

(二) 教育资源投入和教育过程的二元化确立了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距

现代学校教育具有明显的过程性和累积性,个体最终的受教育程度需要通过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的逐级递进和甄选。每一级教育甄选的结果,在微观上是对受教育者个体能力差异和教育效果的一定程度反映,这一点在上一节已讨论过。更重要的是,在宏观上受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城乡区域之间由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所导致的不同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的影响。Featherman 和 Hauser(1978)、Mare(1980)等人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发现,不同人群受教育程度的差异部分源于其个人和家庭背景的不同,部分源于教育分布(distribution of formal schooling)上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为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在教育领域提出“乡村公立小学,以整顿提高为主,一般不作发展;重点放在工矿区、城市”。教育资源的提供执行“两条腿走路”方针^①,城乡差别化政策由此肇始。国家鼓励农村学校就地取材、自制教具、自盖教室、自垒桌椅,在很大程度上将政府办学责任转嫁给农村和农民。后来中央下放教育事业管理权限,教育体制实行“分级管理”原则,在实践中就是“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城市区域的中小学校则大部分由区一级政府统办,中央以及省级政府的重点是提供高等教育。21世纪后“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撤销了乡镇教育机构,实现了教育资源分配在县域范围内镇和乡村的统筹,改善了乡村教育的条件,但是统

^① “两条腿走路”教育方针包括多项并举的内容,就农村学校来说,主要指公办与民办并举、全日制与半日制和其它多种形式并举。

筹层次低,并没有解决教育资源分布在城区与县域之间的差异。

教育资源分布在城区、县镇、乡村之间的差异,一方面导致可提供的入学机会不同,如李春玲(2014)对中国1940-2010年期间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研究就发现,排除不同年代教育机会及人口变化因素的作用,在性别、父亲职业和父亲受教育年数相同的情况下,城市家庭子女进入小学的机率是农村家庭子女的4.9倍,进入初中的机率是3.6倍,进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机率是1.9倍。另一方面表现为以重点学校为典型表现形式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城乡的分布存在巨大差异。这种长期存在于城区、县镇、乡村之间各级教育在显性入学机会、接受优质教育引致的隐性入学机会以及受教育过程上的差异,直接导致在经历若干次甄选和递进式教育后,人口的最终受教育程度在城乡之间出现显著的差距。

(三) 人口结构的城乡异质化加剧了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距

文化教育再生产机制和教育投入的差异可以解释静态环境下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差距的存在及扩大,然而社会人口还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回溯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定义,也可以发现这一指标既受教育因素的影响,亦受人口因素的影响。

人口变动影响城乡人口教育差距变动,表面上看是由于人口从受教育地区直接转移到其它地区,导致流出地和流入地各自教育人力资本存量规模及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异常变动。然而,虽然在总量上教育人力资本的确从流出地转移到了流入地,但如果两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同质的,流动只会改变两地教育人力资本的存量规模,并不会改变其中任何一方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人口变动影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隐含的前提条件是两地人口结构及其受教育程度是异质的。

考察中国的人口变动,主要都是从原本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地区流向较高的地区,如从乡村流向城镇或从县镇流向城市。这样的人口变动,一般情况下应当是拉低流入地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才合理,但为什么反而是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增长最快?现实的原因,即在于人口变动等因素首先造成城乡人口在年龄结构上的差异,进而导致城乡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差距的变动。赵颖智(2015)分析中国城乡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动发现,1964年城镇少儿人口比重(41.6%)与农村少儿人口比重(40.6%)大致相当,其后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开;到2010年,城镇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至14.1%,农村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至19.2%,二者相差5.1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方面,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比重一直高于城镇,1964年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相差仅为0.8个百分点,2010年农村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0%,而城镇为7.8%,二者之间的差距拉大到

2.2个百分点。在人口受教育方面,不同年龄队列人口在受教育程度上具有显著的差异,因为自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开始了一个长时期的教育扩张过程,这意味着不同年龄队列的人口存在不同的受教育机会以及由此导致的最终受教育程度差异。使用不同的人口队列数据,大多研究均发现,随着成年人口队列的年轻化,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断上升,其中只受过小学教育的比例显著降低,而具有高中或大学文化程度的比例显著提高(巫锡炜,2014;王芳,2012)。例如,1960年之前出生的各队列仅有10%的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而这一比例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各队列中却已经上升到超过30%。

导致这种人口结构在年龄队列和受教育程度方面城乡异质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前主要是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还有城乡有别的计划生育政策、较高比例的农村儿童、老人留守等等。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就显示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是流动人口的主力。如2009年监测到的47461名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年,86.9%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其中16-29岁流动人口中超过95%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接受过高中/中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达到40.6%,显著高于农村非流动人口(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0)。尽管原因很多,但结果却是一致的,即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人口的比重在城镇显著高于乡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以常住人口统计和计算得到的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在城乡之间原本就因为教育投入不同而存在的差距。

(四)户籍人口迁移的单向化和精英化是县镇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增长缓慢的原因

文化教育再生产、教育体制和人口结构城乡异质化三个因素形成和加剧了城乡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差距的扩大,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县镇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增长速度最慢。在社会生活方面,虽然县镇与城市存在一些差别,但县镇始终处于社会结构中的同一元,乡村处于另一元。教育方面,虽然教育水平在县镇和乡村之间出现差距缩小的现象符合了新世纪以来教育资源“县级统筹”政策的预期,但是县镇增长速度不仅低于城区,而且低于乡村,显然是超出预期的。因为政策通过统筹改善乡村教育,并不希望以牺牲县镇为代价,即在教育政策方面,并没有理论和现实的证据说明县镇人口受教育程度会因为县级统筹而低于城区和乡村的增长,最低程度也不应该低于乡村。而且,县镇人口受教育水平与城市出现明显差距在1995年前后即开始,早于“县级统筹”政策的推出。

人口方面,分解人口在城区、县镇和乡村之间的变动,本研究发现乡村与城区之间主要是以大规模农民工为主的非户籍人口流动,县镇人口的变动形式主

要是户籍人口的迁移,这种人口变动的不同可能是导致县镇人口受教育程度增长区别与城市的重要原因。鲍曙明等(2005)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户籍限制相对宽松的小城镇的确是人口迁移的首选目标,1982-1987年间,小城镇吸收了39.8%的迁移人口,而城市仅吸收了36.6%。在农村转移人口中,41.3%迁往城镇,32.2%迁往城市。90年代以后,城市成为迁移人口的主要目标,据1990年人口普查和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超过60%的迁移者流向城市,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也证实了这种趋势。而另一方面,农村迁出人口占迁移总人口的比例逐渐下降。既然农村迁出人口比例在下降,城区又成为主要的迁入目标,这一升一降中反映出县镇无论在人口阶段性的非户籍人口流动中,还是在永久性的户籍迁移中都不是主要的流入地,而成为向大城市人口迁移的主要流出源。

虽然在人口户籍迁移中,既有乡村向城区和县镇的迁移,也有县镇向城区的迁移,但是,乡村向外的迁移既不如非户籍流动简便,也没有县镇向外迁移的优势。因为一方面受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限制,制度性地设定了“农转非”渠道和条件,使得只有受教育程度高、获得优势人力资本的群体被赋予进入城镇的资格;另一方面,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考核机制等都成为非常隐蔽的城乡二元分割因素,使受教育程度低和不具备优势人力资本的群体被滞留在乡村。与此同时,县镇人口同样在向大城市迁移,这一方面源于大城市的社会资源更为集中和丰富,二来县镇人口在户籍身份、迁移的成功概率、迁移的便利性乃至迁移的主观动机等方面都比乡村人口更具有优势。这就导致县镇人口变动的主要形式成为户籍迁移而非人口流动。

与非户籍人口流动相比,户籍迁移对城区、县镇和乡村人口教育的影响是更深层次的。因为中国的户籍迁移往往意味着永久性的人口变动,而人口流动一般是阶段性的,甚至是季节性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户籍迁移是内地农村人口迁往边疆地区与农村迁往城镇两种路线兼而有之。但是,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将户籍管理体系作为人口、经济、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之后,户口登记制度成为限制人口自由流动、调控和配置人力资本的重要工具。国家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并赶超世界强国,将整个国家的重点聚焦于城市,优先发展城市的一系列政策逐渐实施。在户籍制度附带的巨大社会福利驱动下,户籍迁移不断演变为向城镇单向迁移,尤其是向社会资源更为集中的大城市迁移,而且迁移人口呈现精英化的现象。

户籍人口迁移的单向化以及迁移的条件性,导致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往往更高,县镇人口变动中迁移所占的比重也更高。迁移人口较高的受教育程度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迁移者积累了此前十几年在乡村或县镇接受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成果),使得迁移无论对城区、还是对县镇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增长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对作为人口迁移主要流出源的县镇影响更甚,这可能是县镇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增长最为缓慢的重要原因。

五、实证检验

(一) 数据描述与基本统计

为验证前面对导致受教育水平在城-乡以及城-镇之间差距不断扩大现象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本研究使用各省社会、经济、教育和人口数据进行检验。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①。

从对数据的基本统计来看(见表3),用以代表城乡发展水平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两项指标存在显著的差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象明显。小学和初中阶段,无论是生均教育总经费支出还是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总体水平与农村水平的比值基本上大于1,说明农村学校生均经费水平普遍低于总体水平,当然会更低于城镇的水平^②。尤其是初中阶段的生均教育总经费,在1995-2013年简单平均的情况下,全国总体水平要高于农村水平15%,最严重的云南省1995年初中生均教育总经费比(总体/乡村)达到3.71,即总体水平比农村水平高出271%^③。人口年龄结构方面,15-64岁人口比重在城区、镇区和农村也存在显著差异,1995-2013年简单平均水平上城区要高于镇区2.6个百分点,高于农村6.91个百分点。人口迁移方面,无论是户籍人口的迁入率还是迁出率,城区都要高于镇区1个百分点左右,显示出城市人口更高的迁移活跃度,而且城区净迁移率(迁入率-迁出率)也要高于镇区,说明户籍迁移人口的流向目标以城市为主。

^①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经平减后以2000年不变价计算;重庆直辖市1997年成立,其1995年的教育数据以四川省1995年数据替代;《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目前只公开到2012年数据,所涉2013年户籍人口迁移数据以2012年替代;基于可比性考虑,未将西藏纳入分析对象。

^② 数据不足之处是公开的教育经费统计中只能反映总体和农村教育经费情况,没有提供区分城市、县镇和乡村;由于绝大部分高中分布在城区和县镇,所以统计中没有区分城乡高中。

^③ 这是极端个别年份的统计数据,其它大部分年份没有如此极端,但农村初中生均教育总经费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的程度是较为严重的。

表3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受教育水平(总体)	150	8.10	1.21	5.18	12.03
平均受教育水平差距(城区-乡村)	150	1.42	0.13	1.26	2.12
平均受教育水平差距(城区-镇区)	150	1.12	0.08	0.89	1.34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千元)	150	9.52	5.57	2.76	31.76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千元)	150	13.05	8.81	2.87	43.85
农村人均纯收入(千元)	150	4.77	3.66	0.88	19.60
高中生均教育总经费(千元)	150	7.34	7.95	0.88	59.25
高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千元)	150	4.57	5.58	0.61	40.57
初中生均教育总经费比(总体/乡村)	150	1.15	0.27	0.73	3.71
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比(总体/乡村)	150	1.08	0.14	0.71	1.47
小学生均教育总经费比(总体/乡村)	150	1.08	0.12	0.67	1.52
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比(总体/乡村)	150	1.05	0.12	0.67	1.48
15-64岁人口比重%(城区)	150	75.98	3.35	68.68	83.53
15-64岁人口比重%(镇区)	150	73.38	3.53	66.33	84.62
15-64岁人口比重%(农村)	150	69.07	4.80	57.72	81.14
户籍人口迁入率‰(城区)	150	25.13	19.18	5.27	151.42
户籍人口迁出率‰(城区)	150	21.45	18.66	3.37	137.92
人口自然增长率‰(城区)	150	5.08	3.76	-8.23	22.38
户籍人口迁入率‰(镇区)	150	14.17	9.07	3.43	66.08
户籍人口迁出率‰(镇区)	150	13.69	8.24	2.92	63.72
人口自然增长率‰(镇区)	150	6.21	4.25	-3.30	24.62

注:面板数据分组内和组间统计后,表格呈现太大,故只提供30个省5年面板数据的组间简单平均统计。

(二)城-乡人口教育差距的影响因素及效应检验

基于前述分析和可得数据,建立影响平均受教育水平城乡差距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如下:

$$DS_{it} = \alpha_0 + \alpha_i X_{it} + \gamma_i Z_{it} + u_i + v_{it} \quad (2)$$

式(2)中,因变量 DS_{it} 是 i 省 t 年时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在城乡之间的差距。自变量向量组 X_{it} 来自可能影响平均受教育水平出现城乡差距的

社会、教育和人口三个方面。参考其它文献,使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镇/乡村)指标反映城乡社会结构二元化的程度;生均教育经费比(总体/乡村)指标反映教育资源投入和教育过程的城乡二元化程度;15-64岁人口比重比指标是城区与乡村各自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的比值,反映人口结构城乡异质化的程度。此外,控制变量向量组 Z_{it} 中,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控制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以高中生均教育总经费和高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两项指标控制各省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水平,因为虽然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几乎不分布在乡村,但却会影响城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高等教育规模及发展水平没有控制指标直接反映,在人口年龄结构中隐含反映。

为了检验模型设定的稳健性,对生均教育经费使用两组不同口径的指标分别与其它变量组合,即高中生均教育总经费、初中生均教育总经费比(总体/乡村)、小学生均教育总经费比(总体/乡村)和高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比(总体/乡村)、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比(总体/乡村)两组指标分别与其它变量指标组合构建两组模型。由于生均教育总经费和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都可以用来反映生均教育经费的投入情况,但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如果两组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稳定,回归系数的值及其t检验结果不发生重大改变,证明模型设定是相对稳健的。

对以上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首先分别使用固定效应估计(FE)、随机效应估计(RE)进行回归分析。从估计结果看(表4中第1列至第4列),只有初中生均教育总经费比和15-64岁人口比重比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比的回归系数只在FE估计中显著,其它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考虑到模型设定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也验证了不可观测异质性 u_i 不仅存在而且与自变量相关。

但是,在理论分析中认为应当影响城乡教育水平出现差距的二元社会结构因素以及小学阶段生均教育总经费等因素的回归系数即使在消除 u_i 影响的FE估计中全部不显著。经异方差检验和自相关检验,发现存在显著的组间异方差,但不存在组间截面相关,需要对异方差进行纠正和处理。因此,使用进行异方差处理的可行广义矩估计(FGLS),结果会更为渐近无偏有效。

基于纠正异方差的FGLS估计结果(表4中第5列和第6列),由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镇/乡村)指标所反映的城乡社会二元化的程度与平均受教育水平城乡差距之间存在统计上高度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回归系数分别为0.0729和0.0789,结果稳健且显著),即社会城乡二元化的程度越高,受教育水平的城乡差距就越大,验证了此前的理论分析。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无论富裕还是落后,受教育水平的城乡差距不会随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自然消弥,即没有出现受教育水平城乡差距的库兹涅茨倒U型发展。

教育资源投入方面,高中阶段生均教育经费(无论是使用生均教育总经费口径,还是使用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口径)虽然不反映城镇与乡村的教育投入差异,但与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城乡差距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分别为0.0020和0.0029),反映出高中阶段教育投入的增加更多是促进了城镇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城乡教育差距扩大。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比(分别使用生均教育总经费口径和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口径)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高度显著为正(回归系数分别为0.0691和0.1971),证实了初中阶段教育投入城乡差距越大,城乡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差距也会越大。小学阶段生均教育经费比的回归系数不完全显著(生均教育总经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一结果并不符合前期理论分析的直接理解,一方面可能是小学受教育年数少,对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有限,小学教育投入城乡差异的效应不足以充分显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小学学历人口比重在城乡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人口结构方面,15-64岁人口比重比(城区/乡村)的回归系数始终高度显著为正,说明15-64岁人口在城市的比重确实高于乡村,而且比重越高,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城乡差距会越大,同样符合前期理论分析。

表4 平均受教育水平城乡差距影响因素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FE		RE		FGLS(H)	
	(1)	(2)	(3)	(4)	(5)	(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千元)	0.0002 (0.0055)	-0.0091 (0.0065)	-0.0014 (0.0030)	-0.0024 (0.0031)	0 (0.0013)	0.0009 (0.0012)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城镇/乡村)	-0.0016 (0.0227)	-0.013 (0.0241)	0.0226 (0.0206)	0.0185 (0.0220)	0.0729*** (0.0119)	0.0789*** (0.0110)
高中生均教育总经费 (千元)	-0.0002 (0.0010)		-0.0001 (0.0010)		0.0020** (0.0008)	
初中生均教育总经费 比(总体/乡村)	0.0386* (0.0226)		0.0385* (0.0231)		0.0691** (0.0271)	
小学生均教育总经 费比(总体/乡村)	-0.0041 (0.0960)		-0.0146 (0.0752)		0.0235 (0.0579)	
15-64岁人口比重比 (城区/乡村)	0.9972*** (0.1421)	1.0798*** (0.1447)	0.9191*** (0.1422)	0.9694*** (0.1459)	0.4839*** (0.1109)	0.5806*** (0.1165)

续表

	FE		RE		FGLS(H)	
	(1)	(2)	(3)	(4)	(5)	(6)
高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千元)		-0.0022 (0.0016)		-0.0007 (0.0015)		0.0029** (0.0012)
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比(总体/乡村)		0.0162 (0.1046)		0.0973 (0.0969)		0.1971*** (0.0679)
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比(总体/乡村)		-0.1951* (0.1165)		-0.1555 (0.1117)		-0.1625** (0.0781)
常数项	0.2802 (0.2059)	0.5472** (0.2313)	0.3217* (0.1780)	0.3778** (0.1847)	0.5385*** (0.1144)	0.4692*** (0.1233)
N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r ²	0.3484	0.3517				
F	10.1587	10.3053				
chi ²			58.6729	56.8443	125.6834	130.4432

注:1. *p<0.1, **p<0.05, ***p<0.01;2. 括号内为系数标准误。

(三) 城-镇人口教育差距的影响因素及效应检验

对于户籍人口迁移导致城市与县镇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差距扩大假设的检验,实证模型同样控制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两项反映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以15-64岁人口比重比(城区/镇区)反映人口结构异质化的程度。此外,模型变量选择聚焦于人口户籍迁移相关指标,以户籍人口迁入率和迁出率来反映人口迁移的相对规模和活跃程度。

对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和异方差检验,确认同样存在不可观测异质性因素 u_i 和组间异方差^①,进行异方差处理的 FGLS 估计结果更为渐近有效。首先,独立分析迁入和迁出的影响效应,从回归的结果(表5第5列)来看,各变量回归系数均在统计上高度显著。和对城乡人口教育差距的影响相类似,城市15-64岁人口比重相对于县镇越高,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在城市与县镇之间的差距也会越大,说明影响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城乡差异的人口结构因素在城市与县镇之间具有类似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下,城市户籍人口迁入率越高,平均受教育水平城-镇差距也越大;县镇户籍人口迁出率越高,平均受教育水平城-镇差距也越大;但县镇户籍人口的迁入率提高同时会

① 检验的内容和结果与表4类似,故不再重复呈现。

降低平均受教育水平在城市与县镇之间的差距。这说明户籍人口的迁入无论对城市还是对县镇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都有提升作用,而户籍人口的迁出则降低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为分析迁入和迁出效应同时作用,最终对城—镇平均受教育水平差距的影响,本研究将县镇的户籍人口净迁出率(迁出率-迁入率)与自然增长率相减,以考察县镇户籍人口净迁出(机械变化)变动在人口自然增长的基础上对教育差距变动的影。这一指标与县镇人口迁入率和迁出率线性相关,所以与除迁出率和迁入率之外的其他变量构建新的模型。从回归结果看(表5第6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5-64岁人口比重比、城市户籍人口迁入率几项的回归系数估计与前面的回归结果(表5第5列)基本一致,说明模型是稳健的。县镇户籍人口净迁出率与自然增长率之差对平均受教育水平城—镇差距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高度显著为正,说明在人口自然增长的基础上,户籍人口的净迁出会扩大平均受教育水平在城市和县镇之间的差距。

概括来说,户籍迁移对城市和县镇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人口迁入无论对城市还是对县镇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都有提升作用,人口迁出会影响县镇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抵消迁入的提升作用后,迁出仍然会扩大城市与县镇之间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差距。

表5 平均受教育水平城—镇差距影响因素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FE		RE		FGLS(H)	
	(1)	(2)	(3)	(4)	(5)	(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0.0109**	0.0116**	0.0052***	0.0049***	0.0048***	0.0040***
(千元)	(0.0047)	(0.0046)	(0.0012)	(0.0013)	(0.0006)	(0.0006)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0.0031***	0.0030***	0.0034***	0.0034***	0.0039***	0.0040***
(千元)	(0.0007)	(0.0007)	(0.0007)	(0.0006)	(0.0004)	(0.0004)
15-64岁人口比重比	1.3862***	1.3816***	1.0588***	1.1453***	0.9421***	0.9788***
(城区/镇区)	(0.2002)	(0.1951)	(0.1747)	(0.1734)	(0.1205)	(0.1205)
户籍人口迁入率	0.0007**	0.0007**	0.0007**	0.0007**	0.0009***	0.0006**
(城区)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0.0002)
户籍人口迁入率	-0.0021		-0.0022		-0.0032***	
(镇区)	(0.0015)		(0.0014)		(0.0009)	
户籍人口迁出率	0.0021		0.002		0.0019*	
(镇区)	(0.0016)		(0.0015)		(0.0010)	

续表

	FE		RE		FGLS(H)	
	(1)	(2)	(3)	(4)	(5)	(6)
户籍人口净迁出率与自然		0.001		0.0015*		0.0023***
增长率之差(镇区)		(0.0009)		(0.0009)		(0.0006)
常数项	-0.4792**	-0.4747**	-0.0877	-0.1681	0.037	0.0113
	(0.2003)	(0.1959)	(0.1810)	(0.1795)	(0.1258)	(0.1246)
N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r ²	0.5923	0.5893				
F	27.5991	32.9986				
chi ²			133.0375	143.9835	317.2916	322.4569

注:1. *p<0.1, **p<0.05, ***p<0.01;2. 括号内为系数标准误。

六、结论与讨论

城乡人口在受教育程度上具有差距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受产业结构、教育布局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差距往往会保持在一定程度范围内。然而,以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测量人口受教育的程度,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近20年间不但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总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逐渐缩小,而是从1995年相差2.37年扩大到2013年相差3.12年。从各省来看,有15个省份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距扩大现象,差距的绝对值相对于1995年平均受教育水平扩大10%以上;9个省份的城乡差距小幅扩大,扩大程度在10%以内;只有5个省份出现了差距小幅缩小的现象。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城市与县镇之间人口受教育程度出现明显的差距。1995年全国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为8.41年,全国县镇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为8.16年,相差仅为0.25年。到2013年时,县镇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仅提高了1.06年,二者的差距扩大到1.61年。

整体来看,县镇和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增长速度在近20年间都低于城市,尤其是县镇区域几乎没有增长,与城市区域出现明显的差距。虽然由此导致县域范围内人口受教育程度城乡一体化的程度提高,但这是一种低层次的、被动的一体化,伴随而生的是城市与县域一体化程度的降低。

针对这一现象,本研究在分析影响因素及机制的基础上,使用公开的统计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理论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

社会基础方面,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城镇和乡村两个相对独立和分割

的群体经过显性渠道(制定教育规制)与隐性渠道(提高社会竞争力),使教育机会的差异和社会竞争力的差异累积为教育结果的差异,两个群体不断地自我强化使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距不断扩大。实证中,由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比指标所代表的城乡社会二元化程度对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城乡差距存在统计上高度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社会城乡二元化的程度越高受教育水平的城乡差距就越大。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代表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在回归中均不显著,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会影响当地人口平均受教育在城乡间差距的大小,即受教育水平的城乡差距不会随着当地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提高而自然消弥。

教育方面,资源投入在城市、县镇和乡村之间分布的差异,一方面直接导致入学和升学机会的差异,另一方面导致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于城市和部分县镇,经历各级教育的甄选和递进式累积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分布就出现城乡差异,高学历人口比重在城镇更高,低学历人口比重在乡村更高。实证中,使用生均教育总经费和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两种口径的指标反映教育投入的程度,回归结果都显示高中阶段教育投入的增加更多是促进了城镇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初中阶段教育投入城乡差距越大,城乡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差距也会越大;小学阶段教育投入城乡差距并不完全显著。

人口方面,近年来大规模的非户籍人口流动等因素使得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人口的比重在城镇地区显著高于乡村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以常住人口口径统计的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实证也显示随15-64岁成年人口比重城乡差异的增大,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城乡差距也会扩大;在控制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下,由于户籍迁移的单向化和精英化,户籍人口迁入无论对城市还是对县镇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都有提升作用,迁出会影响县镇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抵消迁入的提升作用后,迁出仍然会扩大城市与县镇之间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差距。

虽然使用公开统计数据基本验证了社会结构、教育投入、人口变迁对城乡人口教育差距的影响,但受数据所限,对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一是中国的大学基本分布在城市,大学生群体应当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升城市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这种效应虽然可以由15-64岁人口比重指标在一定程度上间接予以反映,但仍然有待进一步清晰剥离。二是人口迁移数据中,县镇人口迁出既存在向城市迁移的情况,也存在向其它县镇的迁移,城市人口迁入也包括从县镇、乡村和其它城市迁入三种情况,虽然数据显示不加区分的城市人口迁入和城镇人口迁出都对城—镇之间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扩大产生了强化作用,但如果能够细致区分各种迁入和迁出及其影响效应,会对结论的精度和可信度都有

积极的作用。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要消除城乡教育差距,目前还没有证据支持城乡教育差距会出现库兹涅茨倒U型发展,要全面实现城乡一体化,需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消弭差距。一是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应当意识到改善县域人口生态和教育生态的重要性,吸引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才留在县镇和乡村。二是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指导思想下,继续实施倾斜政策,重点加强乡村和基层教育,优先向乡村和基层教育配置资源。三是需要进一步优化教育公共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突破“按比例返还税收”和“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过低”的制度束缚,建立需求导向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平衡城乡教育财力。

[参考文献]

鲍曙明、时安卿、侯维忠,2005:《中国人口迁移的空间形态变化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布尔迪厄,1997:《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褚宏启,2009:《城乡教育一体化:体系重构与制度创新——中国教育二元结构及其破解》,《教育研究》第11期。

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0:《中国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报告——基于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人口研究》第1期。

国家统计局人口社科司社会处,2003:《“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方法探讨》,《统计制度改革研究》第5期。

韩清林、秦俊巧,2012:《中国城乡教育一体化现代化研究》,《教育研究》第8期。

何东昌,1998:《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口:海南出版社。

黄维海、袁连生,2014:《1982—2010年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增长与GIS空间分布特征》,《人口学刊》第5期。

李春玲,2014:《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李玲、宋乃庆、龚春燕、韩玉梅、何怀金、阳泽,2012:《城乡教育一体化:理论、指标与测算》,《教育研究》第2期。

李煜,2006:《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林敏,1964:《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改进农村小学教育工作》,《江西教育》第7期。

王芳,2012:《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空间模式及其时序演变》,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王智勇,2012:《教育的城乡不平等及其后果——基于上海、浙江和福建的家庭调查研究》,《上海经济研究》第10期。

邬志辉,2012:《城乡教育一体化:问题形态与制度突破》,《教育研究》第8期。

巫锡炜,2014:《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变动趋势:队列视角的考察》,《人口研究》第6期。

- 余秀兰,2006:《文化再生产:我国教育的城乡差距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2期。
- 张旺,2012:《城乡教育一体化:教育公平的时代诉求》,《教育研究》第8期。
- 赵颖智,2015:《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人口红利视角》,《江汉论坛》第6期。
- Barro, R. J. and J. W. Lee, 1993,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3): 363-394.
- Barro, R. J. and J. W. Lee, 2013, "A New Data Se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World 1950-2010",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4: 184-198.
- Featherman, D. L. and R. M. Hauser,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in *Studies in Popul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are, R. D., 1980, "Soci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Continua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5(370): 295-305.

The Paths and Reasons for Rural-Urba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Gap

HUANG Wei-hai, LIU Meng-lu

(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and urban in infrastructural facilities and some public services has obt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 but in area of education, the gap between rural, town and urba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id not appear a trend like Kuznets curve with general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alyzing historically, the growth rate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own and rural is lower than in urban. By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to key factors and mechanism which would affec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producing and broadening gap is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rough dominant and recessive channels in urban and rural respectively;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high school promote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urban mostly, differences on education fin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junior school result in broade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gap directly, meanwhile the effects in primary school is not significant statistically; migration of non-native residents cause the hetero-structure of popul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nd then lead to broadening of gap; immigration of registered residents promot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urban as well as in town, and emigration lead to broaden urban-town gap even after offsetting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rural and urba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ifference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education